

市场转型中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研究

陈斯诗 胡 荣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福建 厦门 361005;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探讨了市场转型中个人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父辈因素。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父辈因素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人力资本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均有显著影响;政治资本对城市居民有一定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则没有影响;父辈因素对城乡居民影响均较小,且其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目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和社会流动的实现更多的是基于自致性的后天努力,而非先赋性的父辈庇护。

关键词: 市场转型; 城乡差异; 个人收入; 人力资本; 父辈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7)05-0033-09

DOI:10.16614/j.cnki.issn1001-733x.2017.05.004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ndividual Incom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

CHEN Si-shi¹, HU Rong²

(1.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Xiamen Municipal Committee, Xiamen 361005, China;

2.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GSS2008 data,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ndividual incom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human capital is of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fathers' influence.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ituation in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political capital and fathers' factors on individual income. Specially, human capital has obvious influences on the income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hile political capital only has certain effects on urban people but none for the rural. For fathers' factors, its influences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both little, and the effect on rural residents is more obvio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cupation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 and realiz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is greatly based on individual efforts rather than fathers' influences.

Key words: market transi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dividual income; human capital; fathers' influence

曾经一度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寒门焉能出贵子”等论调,似乎折射出一个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沉重的“社会事实”:中国当前正处在一个社会分层固化、社会流动无法顺利进行的阶段。此种未经检验而被放大的“社会事实”一旦被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所认可,很可能将严重影响其价值观,使其减少或丧失奋斗的动力。到底现实情况如何,我们不能仅凭借个案得出结论,我们需要的是基于大数据分析。个人收入是社会分层的一个核心指标,本文将根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数

收稿日期:2017-08-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居民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学研究”(14ASH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斯诗(1986—),女,汉族,福建安溪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分层、农村社会学。胡荣(1962—),男,汉族,福建寿宁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

据,探讨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从而试图回答目前的热门话题——“是否阶层真的固化?”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引发了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巨大变化。在体制转变过程当中,哪些因素影响个体的社会流动和分层?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是否随之发生变化?哪些群体将受益,而哪些群体的优势将被削弱?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对此展开了很多意义重大的研究。然而,在区域差别研究领域,城市和农村差异对比的研究依然非常少见。因此,本文也将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市场转型中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一、市场转型理论及现实研究

最早对中国市场体制变化进行论述的是倪志伟于198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变》。随后,他又发表了多篇文章继续阐述“市场转型理论”。倪志伟的观点引发了国内外众多社会学家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于后社会主义时代再分配权力的重要性是否下降了”^[1]。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例如,认为党的领导和单位制度依然保持而使得政治资本回报也依然保持的“权力维持论”^[2];强调权力向经济转化的“权力转化论”^[3-4]和“基层政府权力扩大论”^[5]。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焦点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以个体的收入作为重要指标。倪志伟研究测量了市场转型将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出现收入不平等,并发生根本的变化^[6]。后来的学者都沿用了这一指标,以个体的收入作为研究的起点^[17-9],探讨各种不同因素,例如政治资本或文化资本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从而揭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34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市场的增长和私有产权的扩展,将出现多种来源的权力和特权。这将减少政治精英对权力和特权的控制,代之以市场为基础的权力竞争。该理论认为,市场转型将促进人力资本的回报增长,而政治精英的利益将会有所下降”^[10-12]。在倪看来,市场分配和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分配逻辑。在再分配体制下,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资源是靠行政命令协调的:通过中央计划和等级组织体系,经济剩余被集中到国家,然后按照国家的目标进行再分配。在这一体制下,再分配者倾向于满足自己,所以收益最大的是等级体系中拥有行政权力的各级官员。而市场经济则恰恰相反:在那里“直接生产者占有大部分剩余”。市场经济的崛起触发了新的资源分配机制,进而挑战并削弱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制度^[7-8,12]。所以市场转型理论有两个基本预言:一、人力资本升值假设,即在市场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呈上升趋势;二、政治资本贬值假设,即相对于人力资本回报,党政官员的经济回报呈下降趋势^[8]。倪志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两个基本假设引导着后来学者在东欧和中国的大量实证研究。

例如,周雪光以中国20个城市5000个居民样本的生活资料史为基础,提出了政治和市场之间共同演化的模型。他的研究发现私营和混合企业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显著增强,这一现象打破了原来传统的再分配制度的格局。这一发现肯定了市场转型理论的部分假设,然而数据仍表明再分配制度有着强大的持续性,也就是政治资本的回报率并没有下降^[7]。魏昂德认为,当市场改革导致农村变化发生的时候,改变或许是源于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而非市场本身的内在因素。他用1996年收集的数据,发现与私营企业的作用相比,政治地位对家庭收入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干部家庭的优势相当稳定,并且预测政治位置的相对回报在未来不大可能下降^[9]。较为典型的反对意见的研究还包括了“权力转化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干部将再分配权力转变成为社会网络资

源并最终转变成成为私有财产^[3],这样就可以使得政治资本直接转化为社会资本,从而维持政治资本的回报。

有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引入具体的制度,从具体的制度、背景出发对“市场转型”进行研究。例如,吴晓刚研究了中国城市中的单位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3],一些学者对产权制度展开了深入辨析和探讨^[14]。对于这些研究,陈那波总结为新制度主义分析,强调社会分层机制的差异是由于其背后的制度框架的变化,这种制度框架的变化形成了多样的利益和机遇结构,从而影响了这些结构中的人努力实现权力和资源最大化的选择^[15]。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市场转型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过程,所以需要在具体的制度中进行考虑。

在中国,市场改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区域差异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制度变迁程度、经济增长模式等各个方面。因此,某一特定的区域往往被视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来加以比较研究。例如,倪志伟对比了四种类型区域,发现市场转型理论只有在沿海自由放任经济地区才部分地成立,而在其他地区,干部的优势仍然很明显^[6]。怀廷的研究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包括上海的松江、江苏的无锡和浙江的温州^[16]。她的研究反映了经济以集体企业为主的地区和以私营小商品和手工制品经济为主的地区,政府行为,尤其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方式上的不同^[15]。

关于区域区别的研究,有一个领域一直被忽视。在文献检索中,我们发现关于城市和农村差异对比的研究非常少,即,对比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哪些人能更容易获得利益和更高的收入?政治资本的回报消失了吗?人力资本的回报又是如何的呢?此类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和农村实施了不同的发展策略,使得城市和农村原有的差异被继续扩大。由于户籍制度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其他一些制度,导致了城乡之间在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私营企业发展水平、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政治资本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正是市场转型理论中,影响个体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如果始终把城市和农村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是不太妥当的。

基于市场转型理论,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问题1:处于高速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国,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父辈因素哪个对收入的影响更大?即个人是否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问题2:在中国城市和农村,由于市场转型的不同制度和背景,是否会导致市场转型的程度不一致,从而使得影响个体收入的因素也存在差别?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描述

(一) 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CGSS2008,对比2010年和2011年数据,这份数据的父辈因素指标和城乡样本比例更适合本项目所探讨的问题,所以特用此份数据。这是2008年11月份到12月份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此研究访问的对象是根据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抽取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居民户中按一定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由访问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调查,^①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000份。本次研究筛选出一些异常样本^②和所需变量为缺省值的样本,最终计入回归模型统计的样本量为

^①具体抽样过程查阅“CGSS2008 抽样说明”。

^②例如:2007年年收入高于“400000元”或低于“100元”的样本。

4750 份。本项研究使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 变量描述

1. 因变量

本项研究的起点亦为个体的收入水平,即统计各项因素对个体收入水平的影响,来探讨资源的配置方式是否发生变化。在问卷中,调查人员向被访者询问了“您个人去年全年职业收入是多少?”。

表 1 2007 年个体年收入描述

			单位: 元
2007 年个体年收入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总样本
均值	8221	19655	14615
标准差	15954	19275	18759
最高值	400000	400000	400000
最低值	100	100	100
N	2090	2654	4750

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划分依据为被访问者的户口类别。从表 1 中,我们可知,农村样本量为 2090 人;城市样本量为 2654 人;总样本量为 4750 人。比较其年收入的平均值,农村个体的年收入均值为 8221 元,比城市个体的年收入的均值 19655 元少 8000 多元。可以大概推论城市和农村的群体收入存在巨大差距,这和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7-18]。本项研究选择的模型是因变量为收入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经统计发现个体的年收入状况呈现的不是正态分布,无法直接放入多元回归模型中,故我们采用大部分研究通用的做法,取个体年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

2. 主要预测变量

正如前面文献回顾中提到的,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焦点在于“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问题。在大多数的实际调查指标的操作中,政治资本的指标为“党员身份”;人力资本指的是“教育水平”。即,文献集中讨论党员身份和教育的经济回报,前者被看作是反映再分配制度的逻辑,而后者被看作是反映市场的逻辑。在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两者是对立的。党员身份背后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而教育水平则意味着个人的能力^[19]。本项研究的原则是,只要可能均使用一般化的分类,方便与以前文献进行对比。所以本文的主要预测变量即为“党员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指标)和“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指标)。在研究中把党员身份当作虚拟变量处理(党员=1),而个体的教育水平因为是定序变量也直接当作连续变量处理,没受过教育赋值为“0”;私塾和小学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赋值为“3”;中专、技校和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为“4”;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和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为“5”;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以上赋值为“6”。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资本方面,城市人口中党员的比例高于农村人口中党员的比例。从人力资本方面看,农村人口大部分的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和初中以下(占 86.1%),而城市人口这部分比例相对较低(占 43.6%);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在农村人口的比例远低于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农村人口比例为 13.9%,而城市人口这部分比例高达 56.6%。

3. 其余自变量

在回归方程中,我们加入了一些个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性别和年龄。“性别”我们将其作为虚拟变量(女性=0)来检验经济回报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和年龄

平方”这两个控制变量也可以当作工作经历或资历,作为测量人力资本的一部分^[7]。

表2 主要预测变量

	单位: 人(%)		
	农村	城市	总体
党员身份			
非党员	2456(95. 0)	2859(84. 4)	5323(88. 7)
党员	130(5. 0)	546(16. 0)	677(11. 3)
个体教育水平			
小学以下	370(14. 3)	117(3. 4)	487(8. 1)
小学	1015(39. 3)	447(13. 2)	1462(24. 4)
初中	839(32. 5)	916(27. 0)	1745(29. 4)
高中	225(8. 7)	753(22. 2)	978(16. 3)
中专/大专(成教)	87(3. 4)	509(15. 0)	596(10. 0)
大专(正规) /本科(成教)	35(1. 4)	362(10. 7)	397(6. 6)
本科(正规) 以上	10(0. 4)	294(8. 7)	304(5. 1)

注: 括号内为百分比

收入不平等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关于代际之间流动的研究。例如,吴晓刚先论证了教育在获取职业和经济报酬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然后通过数据表明,尽管在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的家庭背景包括了个体的户籍状态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从吴晓刚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户籍状态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来影响到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20]。张翼更是直接说明了个体经济地位获得和父辈、家庭因素之间的关联^[21]。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也考虑到了父辈的影响,并用两个自变量来测量父辈对个体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即,“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体14岁时父亲的职业”。父辈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一样被转化为连续性变量,赋值方法也一样。CGSS2008数据是基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O88对“个体14岁的时候父亲的职业”进行分类。笔者根据甘泽布姆^[22]等人的研究将被访者父亲ISCO88分值转化为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①。ISEI是连续变量,分值越大,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三、回归模型和结果

经过前面的分析和讨论,我们确定了本次多元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依次为:性别、年龄、年龄平方、个体教育程度、个体政治面貌、父亲的教育程度、个体14岁时父亲的职业;因变量为Ln(个体的年收入)。

总结起来,这个模型如下所示:

$$\ln(Y) = \hat{a}_0 + \hat{a}_1 \text{Sex} + \hat{a}_2 \text{Age} + \hat{a}_3 \text{Age}^2 + \hat{a}_4 \text{Education} + \hat{a}_5 \text{Party} + \hat{a}_6 F \cdot \text{Education} + \hat{a}_7 \text{ISEI} + \hat{a}$$

\hat{a} 表示未被多元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hat{a}_k (k为0到7)表示对不同自变量的回报进行测量的回归系数。Sex为性别变量(女=0),年龄Age和Age²为连续变量直接放入回归方程,个体和父亲教育程度(Education & F · Education)作为连续变量也直接放入回归方程,个体的政治资本(Party)做

①具体转变代码可以参见: <http://home.fsw.vu.nl/hbg.ganzeboom/isco08/index.htm>。

虚拟变量处理(非党员=0),父亲职业的 ISEI 值^①是连续变量,直接放入多元回归方程。我们把样本分类为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做了两个多元回归模型 1 和多元回归模型 2。为了了解总体情况,又以总体样本做了多元回归模型 3。

表 3 影响个体年收入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

自变量	模型 1: 农村样本	模型 2: 城市样本	模型 3: 总样本
常数	8.434****	8.702****	8.347****
性别	.482(.206)****	.248(.145)****	.302(.129)****
年龄	-.015(-.157)	-.001(-.018)	-.015(-.167)**
年龄平方	-.000(-.054)	.000(.040)	.000(.173)**
教育程度	.323(.288)****	.225(.403)****	.379(.495)****
政治面貌	-.100(-.020)	.109(.050)***	.102(.029)**
父: 教育程度	.077(.060)**	.030(.049)**	.076(.083)****
父: ISEI 值	-.003(-.018)	.000(.012)	.004(.041)****
调整后的 R ²	24.6%	21.2%	32.6%
F	97.175****	101.212****	324.565****
N	2068	2606	4681

资料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第一,总体来说,本项研究所建的三个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解释力度均较高,尤其是模型 3 可以解释 32.6% 的方差,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可以解释 24.6% 的方差和 21.2% 的方差。值得注意的是模型 3 的总体样本的多元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远远高于对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解释力。

第二,性别对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个人年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在农村中性别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较大。数据表明,由性别引起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是存在的,并且在农村中的情况更为严重。在城市样本中, $a_1 = 0.248$, 即男性比女性的收入高出 28% ($e^{0.248} - 1$); 在农村样本中 $a_1 = 0.482$, 意味着男性比女性的收入高出 62% ($e^{0.482} - 1$)。男女之间收入的不平等现象比以往的研究结果更为严重,吴晓刚和谢宇根据 1996 年的数据得出的结果是城市中男性比女性收入高 26%^[1]。女性解放和女性运动的兴起,并没有解决男女之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且该问题呈现更为严重的发展趋势。

第三,年龄对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中的个人年收入几乎没有影响,回归系数和标准回归系数都很小,且不呈现统计的显著性。但是如果把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放在一起考虑,年龄会对个人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年龄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

第四,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对个人的收入均有较高的回报率。在农村样本中 $a_4 = 0.323$, 也就是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38%; 在城市样本中 $a_4 = 0.225$, 也就是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25%。通过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农村教育的回报率稍高于城市中教育的回报率。这个结论和吴晓刚的研究是相似的。吴晓刚认为在农村由于户籍制度,所以只允许其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子女还需继续务农或在城市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那么受过高等教育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子女将产生巨大的差异,也使得在农村中会出现更频繁的代际流动^[23]。

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高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问题 1,数据说明人力资本对个体收入有重要作用。

①在实际调查中,这个问题由于是开放性问题,有部分缺失值。我们在计算时用平均分替代缺失值。

同时也回答了问题 2,说明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城乡差异,在农村的影响力大于在城市的影响力。

第五,政治资本(个体的政治面貌)对城市群体的年收入来说,仍然发现有着显著的回报;相反,政治资本对农村群体的年收入来说,其作用几乎消失不见了。具体为,在城市具有党员身份的个体比非党员的年收入高出 12% ($e^{0.109} - 1$),经过统计检验后也呈现较高的统计显著性($P < 0.05$)。相反在农村的样本中,具有党员身份比非党员身份的对年收入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需要提醒的是,政治资本从全国的样本来看,仍呈现一定的收入回报。所以如果笼统地不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进行地域区分,而仅考虑政治回报情况的话,将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第六,父辈因素变量(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体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情况。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群体和城市群体的个体年收入水平均产生显著的影响,但相对于个体本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度较小($a_6 < a_4$)。在农村样本中,父亲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 a_6 为 0.077,也就是父亲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则个体的年收入大约增加 7%;在城市样本中,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每高出一分,则个体年收入大约增加 3%。数据表明,在农村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更大些。父亲的 ISEI 这个变量对个人的收入水平的影响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都非常小,也不呈现统计的显著性。但是如果不区分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这个指标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相对于个人人力资本,父辈因素的影响力是比较低的,这回答了问题 1,个人人力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父辈因素。现在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等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仅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而不能被推广为是全社会的现实情况。也回答了问题 2,父辈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一) 人力资本和代际流动

人力资本是否有重要的回报是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首先,根据模型 1 和模型 2 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发现自致性的人力资本在农村群体和城市群体均有显著的回报。在农村样本中,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38%;在城市样本中,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25%。

结合先赋性的父辈因素两个自变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收入有一定影响,而父辈的职业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则很弱。可见,一方面,个体的自身人力资本对收入影响非常大;另一方面,父辈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力度有限。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在中国,个体社会经济的获得,更多的是需要自致性的自身努力,而非先赋性的父辈庇护。中国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开放的国家,代际之间的关联并不是那么明显。这和以往的一些研究是相符的^[24-26]。此种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毛泽东时代旨在提升社会平等程度的‘去分层化’政策是成功的”^[23]。

然而,一旦我们考察模型 3,并将其与模型 1 和模型 2 展开比较,就会发现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尚需进一步修正,即代际和区域的不平等都有些被低估了。在模型 3 中,将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放在一起,那么父辈因素和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都增强了,并且呈现出高度的显著性。产生此种统计结果的原因在于:父辈因素和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得分中,城市和农村存在明显的群体性差别,这样如果放在一个回归模型中的话,那么这样的差别就会解释出更多的收入不平等方差。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对城市和农村的这些变量进行了平均数对比。数据表明,在城市和农村,父亲的

受教育程度体现出较大的群体性差异: 在城市父亲的受教育平均水平为 1.507 分(平均水平处在小学到初中之间), 而在农村这个值只有 0.804 分(平均水平在小学以下)。而在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方面, 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 在农村个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 1.530 分(平均水平在小学到初中之间), 比城市的 2.987(平均水平接近高中)的平均水平低 1.457 分。

通过上面的讨论和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 只看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回归模型, 我们知道个体的收入水平更多地是受到自身人力资本的影响。这样我们就验证了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中关于人力资本的基本假设, 也就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 人力资本有着显著的回报。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本的回报体现出一定的差别, 农村人力资本的回报稍高于城市人力资本的回报。一般认为, 城市的市场化水平高于农村, 那么按照倪志伟的假设就应该是城市人力资本的回报也会更高, 这和我们的统计结果不尽相同。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的研究是对市场转型理论的进一步补充, 即市场转型中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其次, 将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纳入同一个回归模型之后, 我们知道父辈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大大增强, 其主要原因在于父辈因素在城市和农村存在群体性的差别。在中国, 父辈对子辈的影响,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户籍身份”。出生在农村或是在城市, 将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个体出生在农村, 那么其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将小于出生在城市的同龄人。因此,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代际流动的时候, 依然需要关注“户籍身份”这一先天条件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

(二) 市场转型与政治资本

40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假设就是, 市场经济的兴起, 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再分配模式产生冲击, 此种冲击最为主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党员干部的政治回报水平下降^{[6][10]}。在本项研究中, 政治身份对城市个体的收入水平仍然有一定的影响。这和以往关于城市研究的文献结果是一致的。根据周雪光的实证研究, 政治资本回报仍然有强大的持续性^[7]。在农村中, 政治资本的作用很小。这和以往学者关于农村政治资本作用的探讨有一定的差别。例如, 魏昂德提出了基层政府权力扩大论, 认为市场化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的过程, 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司化, 地方官员在经济建设和市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将使他们巩固和扩大基层权力, 进一步获得实惠^{[5][9][14]}。

总之, 中国目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和社会流动的实现更多的是需要自致性的个体努力, 而非先赋性的父辈庇护。但由于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在收入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并且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因素在城市和农村也不尽相同, 所以在对中国的市场转型与阶层流动进行研究的时候, 尚需考虑到具体的中国国情和城乡差异的存在。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 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 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等战略举措, 这些伟大举措的逐步实施, 无疑将在今后大大降低城乡差异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和制约, 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消除阶层固化, 早日实现全社会更大范围的良性阶层流动。

参考文献:

- [1] Wu, Xiaogang and Yu Xie.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68): 425-442.
- [2] 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61): 739-758.
- [3] Rona-Tas, Akos.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J]. American Jour-

- nal of Sociology ,1994(100) : 40 – 69.
- [4] Rona – Tas ,Akos and Alya Guseva. The Privileges of Past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Russia and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1(30) : 641 – 662.
- [5] Walder ,Andrew G.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95(101) : 263 – 301.
- [6] Nee ,Victor.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96(101) : 908 – 949.
- [7] Zhou ,Xuegua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105) : 1135 – 1174.
- [8] Bian ,Yanjie and Zhanxin Zhang. Market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1988 and 1995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02(19) : 377 – 415.
- [9] Walder ,Andrew G. Market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2(67) : 231 – 253.
- [10]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 : 663 – 681.
- [11] Nee ,Victor.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Making a Market Economy [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0(156) .
- [12] Nee ,Victor and Yang Cao. 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 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02(19) : 3 – 39.
- [13] Wu ,Xiaogang.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s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J]. Social Forces 2002(80) : 1069 – 1099.
- [14] Walder ,Andrew G. and Jean C. Oi. Property Righ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M]. Edited by J. C. Oi and A. G. Wald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5] 陈那波. 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 [J]. 社会学研究 2006(5) : 188 – 246.
- [16] Whiting ,Susan H.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7] 李晓飞. 户籍与当代中国社会差别——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 数据的定量研究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 : 85 – 91.
- [18] 张卓妮 ,吴晓刚.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来自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证据 [J]. 人口与发展 2010(1) : 11 – 18.
- [19] 边燕杰 ,吴晓刚 ,李路路.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0] 吴晓刚. 1990 – 2000 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J]. 社会 2009(5) : 88 – 113.
- [21] 张翼. 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0) : 27 – 38.
- [22] Ganzeboom ,Harry B. G. ,Paul de Graaf and Donald. J. Treima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2(21) : 1 – 56.
- [23]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J]. 社会学研究 2007(6) : 38 – 65.
- [24] Parish ,William L.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J]. Problems of Communism ,1981(29) : 37 – 53.
- [25] Lin ,Nan & Wen Xie.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Urban China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3) : 793 – 832.
- [26] Blau ,Peter M. and Danqing Ruan.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90(9) : 3 – 32.

责任编辑 彭国胜 英文审校 孟俊一